高教研究选编

2019 年第 5 期（总第 149 期）

武汉轻工大学发展规划处编印

2019 年 6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1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 - 2022 年）.....	7
高等教育如何回应“美好生活”之奋斗目标.....	12
建设高质量普及化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16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21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景展望与建设方略.....	27
中国高等教育从要素性增长到整体性发展.....	32
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优化.....	37
学术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路径.....	40
培养满足现代工程需要的工程科技人才.....	44
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48
如何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目标？.....	60
意蕴与追求：“四位一体”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	66

编者按：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准确领会《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精神，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促进我校内涵式发展，本期选编收集整理“教育现代化 2035”的最新研究成果，谨供学校各级领导、专家参阅。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分为五个部分：一、战略背景；二、总体思路；三、战略任务；四、实施路径；五、保障措施。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将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服务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依法治教、坚持统筹推进。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全面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再经过 15 年努力，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聚焦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

一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贯穿到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落实到教育现代化各领域各环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育战线，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中小学教育，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化、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阐释，健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传播机制。

二是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增强综合素质，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强化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弘扬劳动精神，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覆盖全学段、体现世界先进水平、符合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特点的教育质

量标准，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完善学前教育保教质量标准。建立健全中小学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和体质健康标准。健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制定紧跟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以师资配备、生均拨款、教学设施设备等资源要素为核心的标准体系和办学条件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科学规划大中小学课程，分类制定课程标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并创新课程形式。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增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完善教材编写、修订、审查、选用、退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行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以及走班制、选课制等教学组织模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构建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考试评价制度，建立全过程、全方位人才培养质量反馈监控体系。

三是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以农村为重点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水平，建立更为完善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和投入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园，加快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升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健全控辍保学工作责任体系。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鼓励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振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提升民族教育发展水平。

四是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建立学校标准化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异地升学考试制度。实现困难群体帮扶精准化，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推进教育精准脱贫。办好特殊教育，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全覆盖，全面推进融合教育，促进医教结合。

五是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完善招生入学、弹性学习及继续教育制度，畅通转换渠道。建立

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工作机制和专业化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和 Learning 成果认证制度。强化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功能，开展多类型多形式的职工继续教育。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

六是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建立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持续推动地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标准、评估等方式，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加强高等学校创新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原始创新能力。探索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联盟。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健全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体制。

七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推动师德建设长效化、制度化。加大教职工统筹配置和跨区域调整力度，切实解决教师结构性、阶段性、区域性短缺问题。完善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健全教师职称、岗位和考核评价制度。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健全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强化职前教师培养和职后教师发展的有机衔接。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活补助政策。加大教师表

彰力度，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

八是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

九是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优化出国留学服务。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来华留学质量。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业机构的教育交流合作。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制。

十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教育法治化水平，构建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学校办学法律支持体系。健全教育法律实施和监管机制。提升政府管理服务水平，提升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的能力和水平。健全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提高教育督導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提高学校自主管理能力，完善学校治理结构，继续加强高等学校章程建设。鼓励民办学校按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组织属性开展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创新。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监管机制。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实施路径：一是总体规划，分区推进。在国家教育现代化总体规划框架下，推动各地

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教育现代化规划，形成一地一案、分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生动局面。二是细化目标，分步推进。科学设计和进一步细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划周期内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教育现代化。三是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完善区域教育发展协作机制和教育对口支援机制，深入实施东西部协作，推动不同地区协同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四是改革先行，系统推进。充分发挥基层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大胆探索、积极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为确保教育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把教育改革发展纳入议事日程，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教育现代化。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育系统干部队伍。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二是完善教育现代化投入支撑体制。健全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4%。依法落实各级政府教育支出责任，完善多渠道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完善国家、社会和受教育者合理分担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的机制，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建立健全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的教育经费监管体系，全面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三是完善落实机制。建立协同规划机制、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建立教育发展监测评价机制和督导问责机制，全方位协同推进教育现代化，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主动参与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

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实施方案》指出，今后 5 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以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时代主题，围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这一主线，聚焦教育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紧迫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统筹实施各类工程项目和行动计划，着力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着力补齐短板、优化结构，更好发挥教育服务国计民生的作用，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目标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 2035 年奋斗目标夯实基础。

《实施方案》提出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实施原则：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聚焦重点，带动全局；问题导向，改革创新；分区规划，分类推进。总体目标是：经过 5 年努力，全面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目标，全面构建现代化教育制度体系，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实现更高水平、更有质量的普及，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多样化可选择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丰富，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学习大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实施方案》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十项重点任务：

一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想贯穿课程教材建设全过程，把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有效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增强中小学德育针对性实效性，从中小学生身心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改进德育方式方法，注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潜移默化，开展喜闻乐见、入脑入心的德育活动。提升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当中，深入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大力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加强劳动和实践育人，构建学科教学和校园文化相融合、家庭和社会相衔接的综合劳动、实践育人机制。

二是推进基础教育巩固提高。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健全学前教育管理机构和专业化师资队伍，加强幼儿园质量监管与业务指导。加快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推动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加强对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组织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着力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支持中小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三是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构建产业人才培养培训新体系，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健全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机制，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优化专业结构设置，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标准，完善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队伍、学生实习、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系列制度和标准，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四是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建设高等学校全面落实建设方案，研究建立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的综合评价体系。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燎原计划、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提升研究生教育水平，完善产教融合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科教融合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紧缺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完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监测评价体系。提升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与创新服务能力，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建设一批前沿科学中心，支持高等学校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继续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五是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中小学教师。深化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编制管理，修订高等学校、中小学和中职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分类推进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保障教师工资待遇，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实现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同步调整，完善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分配办法和内部分配办法。补强薄弱地区教师短板，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银龄讲学计划、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六是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支持学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逐步实现信息化教与学应用师生全覆盖。创新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开展大数据支撑下的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推动以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服务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快推进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设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开展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构建“互联网+教育”支撑服务平台，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

七是实施中西部教育振兴发展计划。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以保障义务教育为核心，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稳步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补齐中西部教育发展短板，加快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民族教育。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继续实施中西部高等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东部高等学校对口支援西部高等学校计划，“部省合建”支持中西部地区 14 所高等学校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教育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推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加快乡村振兴急需紧缺人才培养。

八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区域创新试验。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新时代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模式。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发展雄安新区教育，优先发展高质量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以新机制新模式建设雄安大学。深化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交流，促进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相关的人才、科技、信息等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效流动。构建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加大区域内教育资源相互开放的力度，搭建各级各类教育协作发展与创新平台，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和有序流动。促进海南教育创新发展，依托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新时代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九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快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完善留学生回国创业就业政策，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合作，建设“一带一路”教育资源信息服务综合平台，建立国际科教交流合作平台，实施高等学校科技创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行动计划。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大力支持中外民间交流，加强中外体育艺术等人文交流。优化孔子学院区域布局，加强孔子学院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加大汉语国际教育力度。

十是深化重点领域教育综合改革。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积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坚定高考改革方向，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进一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分类考试，完善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和直接攻博等选拔机制。完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全面落实民办

教育促进法，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构建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加强终身学习法律法规建设，搭建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衔接多种学习成果的全民终身学习立交桥，加快发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深入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

《实施方案》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不断提高教育系统党的建设质量，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加快完善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加快推进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教育系统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学校法治工作，广泛深入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三是完善教育经费投入和管理机制，健全财政教育投入机制，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四是加强教育督导评估，有效发挥教育督导“督导评估、检查验收、质量监测”职能，保障教育事业优先优质发展。

《实施方案》最后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上来，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本地区落实方案。各部门要主动履职尽责，确保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国务院教育督导部门定期组织督导评估，压实落实责任。及时总结宣传典型经验和做法，凝聚全社会共同促进教育健康发展的共识，为新时代教育改革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

高等教育如何回应“美好生活”之奋斗目标

陈廷柱

教育与美好生活的关系是教育基本理论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到“美好生活”，既提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也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预期，以“教育与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研究，将会更受重视、更加深入和更为全面。讨论“面向 2035 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回应“美好生活”之奋斗目标应成为我们反思、发展与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支点。

一、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对“美好生活”的漠视是诸多弊端之源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当前发展势头更为强劲，然而问题与弊端也有很多。特别是项目化的发展策略、指标化的评价方式以及表格化的管理趋势等，将多数高校的多数教师置于一种非常令人纠结的境地。此种境遇中的边缘人，既要忙于应对这些事务，却又所获甚少，难免产生失落、焦虑乃至怨恨等消极情绪。而此种境遇中的弄潮者，虽所获较多但又很难在各种诱惑面前止住继续拼搏的脚步，因为太忙太累也容易产生犹豫、抗拒和倦怠等负面心理。网络或微信中有许多诸如“复旦教授：中国教师的日子为什么那么难？”、大学教师“从不加班，因为从不下班”之类的帖子，可以作为佐证。更为糟糕的情况是，项目增多了，指标好看了，管理精细了，而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未必显著提升，大学之精神却备受蚕食。众多高校在可比的、有助于提升排名位次的方面用足了功夫，但在隐性的、有助于提升师生精神境界与幸福感的方面无所建树。即便是师德先进评选等，也流行网络投票等可计量的手段，使原本颇为纯洁崇高的事情亦变成可人为运作的对象。急功近利的思想与行为在普遍蔓延，高校作为精神家园的传统形象越来越模糊。究其根源，可以说是特定政策环境中教师们为生存与生活所迫

所致，也与教师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漠视密切相关。高校用于教师工资福利支出的经费比重普遍偏低，而教师通过项目、奖励等渠道获得的经费资助或现金收入相当可观，这就容易导致多数教师为了争取项目或奖励而不辞辛劳，乃至采取非正当的竞争手段。很多教师已不再习惯于清贫乐道的教学科研生活，或看重教学科研成果所带来的荣誉，或看重教学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实际收益，难以静下心来认真考虑各自究竟需要或适合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部分教师甚至将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于退休以后。易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外部教育政策与过于在意多方面获得感的教师生活态度所产生的叠加效应与连锁反应，势必会冲击教师生活质量，也必然波及教育质量与学术质量。若教师群体丧失对美好生活的信仰与坚守，并在特定环境、政策与措施刺激之下，教学科研沦为谋生手段的情况就很难避免。这或许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诸多弊端的根源所在。

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剖析“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简明扼要地描述了 2035 年我们国家应达到的整体发展状态，其中很多内容与“美好生活”密切相关。高等教育发展既要为之作出贡献，也要与之适应并作出相应调整，前提则是需要深入剖析“美好生活”之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丰富内涵。从高校教师群体来说：

（1）美好生活应是较有尊严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与教师群体的工资收入有关，也与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相关。面向 2035 年，我国需要继续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高校教师群体的实际收入要达到较高水平，应在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对于竞争性的项目经费，必须加大项目监管与社会问责力度，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筛选环节，通过优化项目评选流程与技术辅助平台建设，切实将影响公平公正的各种人为因素控制在最低限度。

（2）美好生活应是较高追求的生活。美好生活需要物质条件作为基本保障，需要良好政策环境加以呵护，更需要有

较高的精神追求以超越外在条件的局限。面向 2035 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务必重视教师精神家园建设，高校教师也须加强自身修养，面对诱惑能守住底线，遇到问题学会从自身找原因，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和以德施教，习惯于在教书育人、钻研学问的过程中体验学术生活的美好。（3）美好生活应是较为自由的生活。高校教师群体具有特殊性，或因为学术事业，或因为个人喜好，往往需要较宽裕的自由支配时间、较充分的自由探索空间以及较便利的出入境与自由流动政策等。面向 2035 年，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不应回避与教师学术生活相关的自由议题，在不违背国家基本原则和学校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有利于高校教师享有多方面自由的人事、外事、教学与科研管理制度。（4）美好生活应是较多参与的生活。高校教师普遍具备参与民主管理的意愿与能力，能否在各级组织中充分表达自身关切或提出个人建议，与教师群体的高阶需要密切相关。关注高校教师的美好生活，必须支持教师参与民主管理，充分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面向 2035 年，着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国家既定的发展目标，需要强调的是，建立健全教师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与机制，提升教师参与民主管理的能力与效果，应在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基层院系的治理事务，需要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以保障和规范高校教师参与各项事务的管理。

三、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应把“美好生活”作为一个基本尺度

发展与改革密不可分，也各有侧重。高校教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亦是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尺度。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也可以说是师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向 2035 年，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更为需要在“不充分”的论断上下功夫，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尤为需要在“不平衡”的问题上做文章。基于此，我国的高等教

育改革必须高度关注可能进一步加大各方面差距的政策或举措。总体来看，首先是省域统筹可能加大区域差距。强调省域统筹是分权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实现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必要条件，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改革方向。然而，省域统筹同时也是一份责任，若某些省份仅仅依靠自身的统筹资源与能力来发展地方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还会加大。即便是布局在各个省份的国家部委直属高校，受区位因素的影响问题也不容忽视。其次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续实施的重点建设政策可能会加大校际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上一直延续着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加快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也是新时代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优先任务。可见，重点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策略，是部分高水平大学所承载的多重特殊使命使然。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我国确有众多高校的办学资源非常有限，也有一些高校在为按时完成经费预算额度发愁，不同办学层次高校之间在生源、师资、经费、权限等方面的较大差距已在社会各界引发较多负面舆论。再次是“项目依赖”可能加大区域、学校、学科、学者之间等多方面的差距。依托项目以达到引领发展、保障重点与宏观调控等多重目标，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显著特征。项目范围之广，项目经费之多，项目影响之大，自上而下的项目依赖行为已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项目的目标是扶优、扶强、扶特，弱势地区、学校、学科与学者获批各种项目的机会要少很多，故名目繁多的项目也是导致或加大各种差距的重要力量。中国各个阶层与社会领域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社会文化心理，高校教师对美好生活的评价与感受也会受到各方面差距的影响。面向 2035 年，在继续实施以上这些改革政策或举措之时，需要警惕差距加大的风险，或者做到统筹兼顾，或者在必要的时间节点将改革的重点转移到补短板 and 全面缩小高等教育领域各个方面的差距上来。

建设高质量普及化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王建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到那时，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但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80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2.7%。这就意味着“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目标提前实现。有学者预测，根据现有发展态势，2018—2020年之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突破50%，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除规模考量外，在质量或水平的维度上，根据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与此“三步走”战略大体对应，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综合上述党和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以及国家发展的相关战略规划可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2035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间位置(从2021年到

2035年；从2035年到2049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年份。基于此，从实践出发，探讨面向2035的中国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而高等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的应有之意。根据“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作为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035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对于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至关重要。从现实出发，面向2035，中国首先需要建成一个高质量普及化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为本世纪中叶实现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基础。具体而言，以建设高质量普及化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为目标，2035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愿景”大致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要点：（1）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的高级阶段；（2）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显著提升；（3）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普及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00年以前，世界上只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50%，但到20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有56个国家和地区，世界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达到32.83%。发达国家达到74.14%，转型国家为55.67%，而不发达国家也达到了26.69%。按照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年3%左右的增长率，到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会超过75%。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水平绝不仅是毛入学率的问题。就目前而言，“如果就毛入学率、净入学率、新增劳动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指标而言，我国已经离普及化的及格线不远，这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结果，也是足以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发展成就。但是，如果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离普

及化还有相当的距离，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实现。”此外，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的高低也不能仅仅看高等教育毛人学率的高低，它还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优化以及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的构成比例密切相关。据统计，2014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高等教育毛人学率达到37.5%。201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人学率达到40.0%。201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人学率达到42.7%。但仔细梳理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上的数据会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的“数量”增长固然可喜，但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中普通高校在学生比例偏低，而研究生在学人数所占比例更低，专科生在普通高校本专科在学总人数中的比例则过高。以2016年为例，3699万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中，研究生仅198.11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2695.84万人，其中专科生就有约887.16万人。此外，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有584.39万人，通过自学考试学历教育取得毕业证书有67.77万人。2035年我国要实现科技实力大幅跃升，仅有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或较高的毛人学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扩大普通高校本科生，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确保更多的人接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具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要进入普及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1）普及高中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的教育，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有进入普通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大幅提高普通高校在学人数在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中的比例；（3）大幅降低普通高校专科生在学人数在普通高校本专科在学总人数中的比例；（4）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提高研究生在学总人数在普通高校在学总人数中的比例。

二、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过小的高等教育规模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与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不强之间的矛盾。面向 2035,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不仅要实现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高等教育,而且要确保他们接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近五年来,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投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还是从社会服务能力来看,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都在迅速提升。2015 年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布,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步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未来五年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成长和成熟需要时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所确定的“三步走”战略既充分考虑到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注意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迫切需要。根据“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设定,到 2030 年,我国将有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那时,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2030 年“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对于 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至关重要。面向 2035,必须坚定不移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显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

三、建立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实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工作母机”，没有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社会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也很难实现。所谓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绝不是指办学条件或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指办学思想的现代化，而主要是指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现代大学制度，真正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仍偏重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点建设，高等教育改革中对于组织绩效的关注也多于对系统或体系的完善。但事实上，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远比一流的大学或学科要更加重要。“21 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新的信息技术对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冲击，而普及化的根本意义在于要创造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和系统，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终身教育。”从未来反观现实，只有依托一流的创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面向 2035, 可以预期，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提高，到那时我国将拥有史无前例的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这个异常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的高校必须认真思考，如何融入现代终身教育体系，究竟提供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才能为每个学生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做好准备，才能为下一个阶段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卢晓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既为“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即“双一流”建设的重点是内涵建设，同时也为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确立了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向。

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动态意蕴

所谓内涵，指的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而内涵式发展则指的是发展结构模式的一种类型，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式，强调的是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实力增强。对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言，既有高等教育体系的内涵式发展，又包括高校的内涵式发展。

尽管“双一流”建设是近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提法，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则是已有经年的概念。同时，它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高等教育的不同发展时期对其内涵的理解和诠释并不尽一致。

比较正式提出内涵式发展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九十年代，高等教育要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探索发展的新路子，使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努力提高办学效益。”这是官方文件第一次正式使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这一概念，而且，这里的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是从“提高办学效益”来说的，具体而言，就是“指在原有高等教育规模的基础上，以挖掘高校内部潜力为主，来扩大高等教育容量”。由此可见，“内涵发展”在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的语境下主要是一个“效率”的意蕴。正是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这一意蕴下，我国高等教育

规模与容量有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1998年，招收本专科学生突破100万人。

1999年初国务院批转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规模要有较大扩展，到2010年毛入学率达到15%”，从此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以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模式。1999年当年招收普通本专科生约160万人，比1998年增幅高达47.4%。此后几年，在各方合力作用下，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招生规模连年大幅度增长。2002年，普通本专科招收32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达到15%，比2010年提前8年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准目标。但是，由于这种扩张仍然是在传统内涵发展思维模式之下进行的扩张，且主导思想是“增长即发展”，显然在此情形下，“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无多大差异，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扩张的直接后果便是生均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锐减，高校的办学质量受到质疑。仅以生师比为例，1998年，在校普通本专科学生与专任教师之比为8.4:1，1999年增长为9.1:1，到2006年生师比已达16:1。

实际上，高校扩招带来的质量问题从一开始就引发了社会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声音一直伴随着扩张过程。教育部也在高校扩招不久便正式启动了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试点，即针对不同层类的高校，分别开展了高校本科教学的合格评估、随机性评估和优秀评估。特别是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制定并颁布，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话语开始由“扩招”“提高大众化水平”转变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高等教育内涵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并特别强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显然，这一次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问题导向的产物，而且，它是与扩张外延式发展相对立的，自然也与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的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即此时的“内涵式发展”已不再同外延扩张近义甚

至同义，而回归其原生涵义，即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属性的关注，即强调高等教育“质”的发展。尤其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内涵式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高度聚焦到高等教育质量上。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将十八大报告的“推动”，改为“实现”，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目标迈进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首要条件便是高等教育内涵获得充分发展。“时代是思想之母”。笔者以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时代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

20 世纪 80 年以来，“质量”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三大核心概念之一，且至今没有变化。同时，该组织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方面和一切功能。而人才培养无疑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方面。如前所述，“双一流”建设重在内涵建设，其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脱离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核心，没有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就很难称得上是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目前大学办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才培养事实上并没有成为大学的根本任务，教学与科研“两张皮”的状况还比较普遍，甚至不少大学教学与科研呈现出某种对立状况。如何确立人才培养作为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地位，解决好教学与科研“两张皮”现象，真正做到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应当是当前“双一流”建设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是体制机制创新

首先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这里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促使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里蕴含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便是高校办出特色要聚焦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创新上，这也是“双一流”建设亟需破解的难题。二是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际上“校企合作”并不是一个新提法，它与过去的产学研相结合是近义的概念，不过以往这种合作大多是基于各利益主体，从取长补短的角度，通过合作促使各分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不同在于，通过建立深度融合机制，将各利益主体一体化为共同的利益主体，即“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利益的共同体、发展的共同体。三是落实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机制。包括高校人才培养与中小学人才培养的相互衔接，一流大学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等。

其次是“放管服”改革。要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最终达成善治，关键在于建构一个为大学组织成员广为认同并尊重的制度。因为一种制度能否有效实行，主要取决于该制度所制约的大多数人对制度的认同和尊重程度。只有个体的制度认同得以内化，并产生制度期待行动，制度的工具性功能和制度化过程才宣告实现。笔者曾调查不同发展目标定位的高校的学术制度施行状况，分析身在其中的高校青年教师对本校学术制度的认同情况，并与其学术发展行动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探究不同类型高校的青年教师的学术制度的认同情况如何影响学术发展。研究表明，当前以少数拔尖人才为目标的学术锦标赛制设计与多数青年教师的利益偏好和价值信念并不相吻合，因此青年教师的制度认同度普遍较低，其学术行动多属于制度压力下的应激行动，不利于长远的学术发展。

再次是从固化身份到动态身份。对于身份，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即身份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那

在我们有可能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由上可知，身份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实际上是难以“去”掉的，而且它作为一种可能的未来存在所具有的内在动力机制功能，对于组织和个体的发展必不可少。但一旦身份固化，身份带来的内在动力便失去了持续性。当前“双一流”建设的要旨就在于动态身份，而不是去除身份。除了组织（高校）外，对于个体（如教师）来说，动态身份的意义也是如此。近年来在高教领域里“重岗位、轻身份”的人事制度改革，其旨趣也在于建立动态身份机制，优化师资结构，形成教师的内在动力机制。从宏观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还涉及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效益的提高等方面，这也有赖于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

（三）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高度是大学文化的价值建设

真正意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例外都有一流的大学文化。综观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大致可归纳出以下几个基本的价值特征：一是向学的追求，这是大学文化的本质价值，大学对知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使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二是学术的自由，这是大学文化的永恒价值，也被认为是大学“永恒不变的原则”，历久弥新；三是自我的坚守，这是大学文化的精神价值，也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高地；四是开放的办学，这是大学文化的现代价值。现代大学应当走出“象牙塔”，主动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现代大学要走向国际化，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相适应。

如果说以上对一流的大学文化的价值认识具有相当的国际化成分，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像对待任何文化传统一样，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备加珍视我国大学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继承且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化传统进行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改造，赋予其时代的内涵。这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一流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学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是价值建设。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我们会时常面对要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情形，如对“双一流”建设的评价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所谓事实判断，更多的是着眼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量化指标的达成而言的，而价值判断则关注和强调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终极价值。“双一流”建设必须建立起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事实判断中要有价值引导，而价值判断中则需以事实判断为依据。目前，过于量化的事实判断缺乏价值的引导，如对教师的业绩认定与评价往往侧重于简单的量化数字，并以此作出价值判断，从而产生了错误的价值导向。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一名教授终身工作的质量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要对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或研究发现的质量进行量化看来是不可能的”。

因此，“双一流”建设须选择反映现代大学的现代价值的指标导向，尤其应注意选择与现代大学发展方向和规律相一致的指标导向。同时，“双一流”建设要十分重视非量化指标性的一流建设，如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现代大学制度等，尤其是通过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调动各方积极参与的长效建设机制。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景展望与建设方略

顾建民

对于加快“双一流”建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重要手段，也是应有之义。一流也好，强国也罢，都是以世界为舞台和参照系，脱离国际化就无从谈起。正如国际大学联合会（IAU）所言：“国际化是高等教育持续变革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日益成为变革的核心动力。”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时代，展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前景，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机制，对于自觉、理性地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尤其必要。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大众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趋势，大众化、市场化仍在深化发展，信息化、国际化正在加速发展。就高等教育国际化而言，其发展趋势不仅难以逆转，而且在多个层面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在学校层面，高校普遍重视国际化，其中多数高校已经或正在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加以全面推进。根据2014年IAU的第四次全球调查，在131个国家的1336所高校中，认为国际化很重要和重要的分别占到69%和25%并且53%的高校专门制定了国际化战略，22%的高校正在准备之中，16%的高校虽无专门的国际化战略，但将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相较于2010年IAU的第三次全球调查，认为过去三年国际化的重要性有所增强、持续增强和仍很重要的合计高达88%。可见，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并有持续增长之势。美国研究型大学总体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也没有妄自尊大，坚持开放包容办学。据2016年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组织的问卷调查，在美国203所具有博士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中，64%的大学将国际化置于本校的优

先发展战略位置，45%的大学制定了全校性的国际化发展战略，65%的大学设置了专门推进国际化的校级委员会或工作小组，便于将国际战略落到实处。

在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意义，接连出台计划或项目用于推进国际化发展。日本为配合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国际国家”战略定位，较早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方针，进入21世纪以来陆续推出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动计划，例如2008年的接收“留学生30万人”的计划，2009年的“全球30计划”2014年的“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着力从整体上提升日本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2014年接着发布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办、国办印发，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教育对外开放从“扩大”转向“做好”，加速做强中国教育，国际化从教育政策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无不把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国际层面，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将会更加深化。欧盟出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需要，从1976年实施的“联合学习项目”到1987年建立的“伊拉斯谟项目”，再到2013年在“欧盟2020战略”大框架下推出的全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为欧盟成员国及其高等教育机构提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宏观政策指导以及政策和项目支持，并从“欧洲维度”拓展到“世界维度”。伴随高等教育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的上升，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也会更趋激烈。IAU的调查显示，国际高等教育从过往的合作为主开始转向更多的竞争。事实上，合作与竞争难以割裂，通常是并行发展，即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为了竞争，通过合作取长补短或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竞争促进合作，经过竞争知彼知己，激发教育活力和合作动力。尽管合作的动力可能各有所需，但

合作与竞争之间的良性循环必然以相互尊重、平等互惠为基础，否则难以可持续发展。校际层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同样如此。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机制

高等教育国际化何以持续发展，其背后显然有诸多力量作支撑。奈特（Knight J.）曾从政治、经济、学术、社会/文化四个维度，在国家、院校两个层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结构进行系统分析，认为这四种力量在国家、院校层面上互相交织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层面的国际化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更容易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种动力结构分析在实践上仍然得到支持。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尽管不时受到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政治上国家安全与移民政策收紧、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因素的不利影响，但相比之下有利因素更多，比如：世界多极化有助于全球共同治理；留学市场供需两旺，促进人员流动和教育交流；信息技术发展使得教育资源跨境流动共享成为新常态；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对跨文化交流提出更多的需求；全球化问题有赖于地球村居民携手合作。

从 IAU 的调查数据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外部动力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政策、工商界的需求、国家与国际上的排名、来自国外高校的需求、人口趋势、地区政策、高等教育公共资金的短缺等。就全球范围、亚太地区、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而言，排在前三位的国际化动力分别是各级政府的政策、工商界的需求以及国家与国际上的排名，非洲是国家与国际上的排名、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来自国外高校的需求，中东地区是国家与国际上的排名、工商界的需求、各级政府的政策，欧洲是各级政府的政策、地区政策、国家与国际上的排名，而北美地区是人口趋势、工商界的需求和来自国外高校的需求。由此可见，各个地区由于经济社会、高等教育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环境不同，其国际化动力是各有侧重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尽相同，来自

全球、国家和本土维度的制度力量共存交叉，其中既有趋同力量，即存在制度原型（同质），又有趋异力量，表现为经改造、调整、适应后的各民族国家制度（异形）。

对于高校来说，处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中，重要的是不能迷失方向、随波逐流，而是要找准定位、乘风破浪。各种作用于高校国际化的力量，按其功能和性质可分为以国际、国家层面的规则和政策为代表的具有“不得不做”的强制性（推动力），以学术规范和国际排名为代表的具有“应该做”的规范性（牵引力），以及以学校的认知和文化为代表的具有“想要做”的内驱性（驱动力）。这些力量时常不一致或者不同步，引发矛盾和冲突，制约高校国际化发展。这使得战略管理在高校国际化发展中的作用凸显出来。

三、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方略

上述的《若干意见》是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强调以顶层设计和落地措施为抓手，提质增效和完善治理为重点，加速做强中国教育为核心，全面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宗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关键是院校层面增强一流意识，加强战略管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重点需要实施以下基本方略。

首先，要实现国际化动力转换。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总体上说政府比高校更重视，学校上层比中层和基层更重视，所以亟需从“政府动力”转变成“高校动力”，从高校“上层动力”转变成“中层和基层动力”，从“行政动力”转变成“学术动力”，更需要从“理论动力”转变成“实践动力”，让学校和师生成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导力量。

其次，要实现全面国际化。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持续发展，全面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选择和发展方向。《若

干意见》站位高远，既有中国特色，也与全面国际化的主流方向不谋而合。欧盟、美国也都在力推全面国际化发展战略，将国际和比较的视野融入高校教学、研究与服务的各个方面，重塑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CIGE）基于“全面国际化是一个战略性的协调过程，努力将国际化政策、项目、行动联结和整合起来，使大学和学院更加开放，成为与世界紧密相连的机构”，构建了全面国际化的 CIGE 模式。其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理念和策略值得一流建设大学的重视和借鉴，当然其他高校也要坚持一流意识，从国际化特色建设入手，逐步走向全面国际化。

再次，要实现有效国际化。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既要注重国际化的战略规划，也要强调战略实施、评估和监控，把提质增效和完善治理落到实处。一方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双向开放质量与水平；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应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

中国高等教育从要素性增长到整体性发展

李立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等教育要实现内涵式发展。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要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发展模式由要素性增长转向整体性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通过跨越式发展，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人才需求，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6 个百分点。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外延式扩张是主要方式，更多强调了以规模和速度为主的要素性增长。在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中，高等教育的作用地位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高等教育由更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基础支撑作用到支撑和引领并重。随着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的引领发展作用将会逐渐加强，会发挥火车头和发动机的作用。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作用与价值，以创新理念改革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结构、质量、区域发展等方面有待加强，亟待由要素性增长转向整体性发展，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要素性发展把整体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某一种要素、某一个方面的发展在某一个发展阶段置于绝对化、至上化的地位，而导致了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失调和分裂，如 20 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在最初几年就过分强调了速度与规模。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要素性发展中造成的。要实现内涵式发展，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整体性发展就成了解决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关键。从根本看，整体性发展是对要素性发展的摒弃和超越，形成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高等教育新模式。

一、高等教育发展由传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扩展到社会公正与文化价值的功能

高等教育发展必须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相适应、相协调。高等教育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否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基本前提就是看高等教育改革是否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改革相协调、相适应。高等教育作为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结合点，主要通过培养创新人才、产出一流科研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传承文化创新来支撑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高等教育事业作为社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其改革要受到经济社会改革的拉动而不断深化，同时高等教育改革又会受到其他改革的牵制和影响，其改革的进程受制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改革所提供的环境和条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其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最终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高等教育改革不可能超脱于整体国家改革之外，其改革必须与社会的各项改革相协调、相适应、相配套，否则，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不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高等教育的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科技功能等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相对比较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功能。实现现代化，除了继续关注经济功能之外，我们还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既要重视高等教育和经济工作的联系，也要重视高等教育促进政治文明、文化传承创新、科技创造与科技素养等提升的功能。现代高等教育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和国家的，肩负着传承文化、发展文明的重任，对于提高学生的国民素质与文化认知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理解与交往能力都起着重要作用，国际人文交流对于国家发展也很重要。高等教育的人文交流或者文化的传承创新正在成为高等教育新的职能。现代高等教育不但要促进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提升个体的文化素质和促进社会发展及文化传承创新。

二、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重塑大学发展的整体性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有社会环境发生变革的原因，也有高等教育本身的不适应，根本上看还是高等教育在面对社会转型引发的巨大变革时没有适应和引领这种变化，而是偏离、遮蔽和弱化了高等教育的整体功能。高等教育的四个功能不是相互独立的，也不是并列的，从大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逻辑看，是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中心，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从而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其内涵是类似于研究性的教学，研究与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规训心智与塑造品格。最早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科研除了为教学服务的功能之外，还有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与价值，所以，教学与科研的相统一的关系是松散的，既有密切结合的一面，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可以看作大学的本体功能，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可以看作是大学的衍生功能，本体功能对衍生功能具有决定性作用，衍生功能对本体功能起辅助作用。在大众化、普及化时代，应重塑高等教育功能的整体性，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功能，部分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也应该重视科学研究功能，要从总体上把握高等教育功能的价值，避免功能分割与失衡。

三、建立全面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强调高等教育的公平性

高等教育整体性发展要求不再只是关注少数大学和少数学科发展，而是要为每类高校发展提供合适的机会与舞台，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提供适切的、有质量的教育，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作为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我们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无比的热情，对于诺贝尔奖有着无比的期待，对于攀登世界教育高峰有着无比的追求。所以，早在国家出

台“双一流”政策前后，广东、浙江、安徽、北京等省市已经纷纷出台支持政策，大力支持“双一流”建设，这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和利好。在重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一般学校和一般学科的发展。应该尊重教学和科研不同的规律，教学资源要做到公平配置，科学研究要提倡公开竞争。在教学领域应努力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使每一位大学生都受到合格的高等教育；在科研领域应建立公平公开的竞争机制，以竞争促发展。

高等教育现代化就是建成全面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马里兰大学高等教育学名誉教授伯恩鲍姆在 2007 年指出：“各国各地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世界一流的社区学院，世界一流的农业学院，世界一流的教师学院和世界一流的地区州立大学。美国没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它有很多世界一流大学一应代之，因为美国有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所以它有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没有一流的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就很难建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作依托的世界一流大学，可能就是一堆数据评价出来的，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很难有多大价值，也很难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尊重。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矛盾对立的。全面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应是各类高校各具特色，各展所长，办出水平。

四、强调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注重发展的协调性

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成为一个“分裂”的体系，体系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有着各自的价值定位和使命特色，有满足不同社会需求的服务面向。高等教育发展必然由“同质化”走向“多样化”、“异质化”。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国将逐步形成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以应用型大学为代表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和以示范性高职高专为代表的技能型高校，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

育分类体系。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通过构建“普通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完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条例》，引导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科学定位、各安其位。高校分类标准要摒弃传统单一的政府或学术视角，代之以适应政府、社会、高校的多维视野，分类框架应具有概括性，分类指针应具有开放性、弹性和互动性，且尽可能简便易行，从而构建起类型与层次相互结合的、多元包容的高校分类框架。

推进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梯度层次，这一结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伴随我国经济区域发展形成的，体现了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其合理性。把握好东部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关键是各自找准定位，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不是上规模、上层次，而是要面向区域、服务地方，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适度发展和培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学科专业和高素质人才。要考虑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一般而言，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依次呈现递减状态。如博士研究生教育对师资队伍、科研经费及办学水平都有较高要求。因此，发达国家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也是集中于少数地区的少数研究型大学。我国要在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中心区域大力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在重点大学大力发展硕士研究生教育，一般院校以本科教育为主。

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这需要改革现行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展中心城市办学模式，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转变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采取不同的手段和策略，发挥协调、支持、引导、服务、监督等作用 and 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良性互动提供法律、政策、制度、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面向全国、面向大区、面向地方的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

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优化

周海涛

高等教育现代化始终与国家现代化同向同行。2020—2035 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竞争态势，面向 2035 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亟需聚焦创新型国家建设、产业布局、区域发展等战略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亟待精心“下好”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这盘“棋”，打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升级版，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支撑”作用转变为当前和未来的“率先引领”作用。

一、面向创新型国家战略，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整体部署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建设高水平、强特色的一流高校，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扎实的人力与科技资源基础。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看，2017 年达到 795 万人，超越 2016 年的 765 万，创历史最高，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就业难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矛盾，而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对经济社会变化和科技进步响应滞后。当前，正确认识高校办学层次与办学水平的关系，坚定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高校都可以办成一流高校的信念，是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基本前提。高校办学层次的不同只体现在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办学水平的差异则反映服务质量的高低。不同层次的高校培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是有不同的，但是“爱因斯坦的活，爱迪生干不了；爱迪生的活，爱因斯坦也干不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两类人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很重要。

加快推进一流高校建设，新阶段的“任务书”就是要进一步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高质量、更加公平高等教育的需求；新阶段的“路线图”就是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阶段的“时间表”就是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相一致，实现教育现代化。同时，要聚焦国家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建设目标，坚持公办和民办高等教育同等地位，以“双一流”建设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为“双引擎”，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建立健全高校分类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分类设置、指导、支持和评估，引导、鼓励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显著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实力。

二、面向产业布局升级，重构高等院校的类型布局

在传统办学模式惯性作用下，一些地方忽视高校分类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今仍在沿用精英教育的办学思路，一味向复合型、学术型、研究型高校看齐，一定程度上存在定位不明、特色不显、目标趋同、跟风抬格、求大尚名、模式单一等现象；在 2000 年前后的第二次院系调整中，一些行业背景非常鲜明的高校从行业主管部门划转地方，合并调整升格或更名后，有些丧失了原有的应用性、技能性的传统优势，致使这些高校定位模糊，人才培养类型、层次特征不清晰，行业办学特色弱化严重，以至于与行业企业、协会、部委渐行渐远。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业的改造升级、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等，高等教育的院校结构布局难以对接，贴近产业不紧，学科专业结构布局硬化老化，人才培养素质结构不合理，在未来增量优化和存量调整中，亟需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紧贴行业、产业的发展重构院校结构布局。

高等教育的院校结构布局，必须发挥支撑和引领主导产业、重点产业、支柱产业等不同产业层次发展需求的重要作用，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产业的改造升级。面向中国制造 2025、健康中国 2030 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国家经济社会重大发展需求，契合不同产业中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对各类人才的发展需求，通过增量优化院校布局，重点设置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民族传统工艺等产业布局的本专科院校；通过存量调整院校布局，优先鼓励、支持和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院校转型成为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应用型高校和“小而精”特色高校；对接产业聚集区重点支柱

产业及新兴产业布局需要，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系统考虑、超前布局层次与类型不同的院校。

三、面向区域发展战略，调整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

在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大势下，更多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关键点。除了我国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异大外，各地区省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集中表现在高校布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高等教育区域性结构失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制约科技实力提升和高端人才培养的一大瓶颈。此外，不同省域的实际情况不同，与地区经济、人口和高等教育历史相适应的结构布局亦是不同。

面向区域发展战略，需要以适应、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优化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聚焦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战略，以及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点建设区域，需要重点谋划、超前布局、精准对接、综合施策，调动各类高等教育资源优先服务重点建设区域。在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区域战略中，充分考虑区域人口、产业、文化、资源等不同发展特点，新增设置院校向基础薄弱地区、空白地区、城镇化地区和产业集聚区倾斜，尤其要补齐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短板。在东北振兴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战略中，进一步激发各级政府、社会和高校办学活力，发挥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和地级市的区域优势，下放举办高等教育方面的权力，鼓励经济发达区县参与高等教育办学，形成省内均衡的高等教育办学、管理新体制，建立科学的区域高等教育网络。

面向 2035 年的高等教育，尤其要聚力创新型国家建设、产业布局 and 区域发展的战略需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网络体系和院校结构布局，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夯实框架基础。

学术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路径

胡钦晓

自 1999 年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规模迅速扩张时期。及至 2016 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699 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 20%，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提前实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确定的 40% 目标，正在向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迈进。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国家适时提出了建设“双一流”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战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教育要优先发展，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事实上，无论是高等教育大国，还是高等教育强国，都是建立在与他国比较的基础之上的。高等教育大国，主要强调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高等教育强国，主要强调质量之高、学术之强。因此，从学术视野下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路径，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是学术：基于高等教育竞争的核心元素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什么强调学术之强，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理论问题。毫无疑问，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一流大学”和数量众多的“一流学科”，而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和学科之间竞争的结果。学术能力强弱之于学科的重要性无须赘言，对于大学同样如此。伴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大学凭什么与别国大学竞争，进一步来讲，我们与其他国家大学主要是竞争什么。这必然涉及大学资本多样性的问题，因为大学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大学间多样资本的竞争。根据前人研究成果，结合大学组织特点，我们认为，大学至少拥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等。所谓大学

学术资本，就是大学通过自身所拥有的稀缺性专门知识、技能等高深知识，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中，形成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以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为约束，通过内外部交换，进而实现价值增值、提高自身存在和发展竞争力的资源总和。由高深知识带来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是衡量一所大学学术资本多寡的重要指标。

经济资本的多寡并非大学之间竞争的核心要素，中世纪时期，行会性质的大学既没有稳定的校舍，也没有图书馆、实验室，但是大学仍然得以产生并发展壮大。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学之母”，依靠的是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的连结和影响。社会资本也非大学之间竞争的核心元素，19世纪的德国大学能够在国家一元资助下，迅速超过其他欧洲大学并登上世界高等教育之巅，依靠的是对“纯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不懈探求。大学是从事高深知识的场所，这一基本性质界定了学术资本是大学诸多资本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资本形式。基于高深知识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的竞争，既是大学竞争的核心元素，也是高等教育竞争的核心元素。当大学的学术创新思想趋于泯灭，当大学掌握的高深知识趋于陈旧或者不再稀缺，大学的学术声望必然滑落，大学在竞争中也就处于劣势。中世纪萨莱诺大学的没落，为学术之于大学竞争的重要性提供了鲜明例证。

二、什么样的学术：高等教育强国演变的历史回顾

在澄清学术之于大学竞争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换言之，在当下世界高等教育急剧变革时期，什么样的学术可以让我们国家的大学后来而居上，可以使我们由高等教育大国崛起为高等教育强国。简单回答这一问题，无疑是创新的学术。如此回答尽管正确，但不具有可操作性。学术如何创新，朝着什么方向创新，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清晰发现学术变革伴随着高等教育

强国演变的轨迹。中世纪时期，以神学统摄的学术发展占据主流，当时神学研究的重镇巴黎大学声名显赫，从而也使得法国成为中世纪学者心中的学术麦加。及至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神学统摄学术已渐成明日黄花，英、法、德三个国家走上截然不同的面向。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醉心于古典学科和绅士教育，文学在学术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国在取缔巴黎大学等传统大学的废墟之上，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功利主义为导向，建立起大学校，技术在学术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文学过于浪漫，技术过于功利。英法两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地位，很快被以唯心哲学为统摄的德国大学所取代。强调学术自由，追求“纯粹知识”，通过研究促进教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大学理念，很快使德国大学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效仿对象，并使德国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长达百年。19 世纪中后期，在德国大学沉迷于脱离生活实践的哲学统摄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一方面主动吸收德国大学精髓，另一方面积极融入本土文化特色，建立了以实用科学为统摄的学术发展理念，从而使美国逐渐代替德国在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拐点，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地位也已长达一个世纪。如今，以实用科学为导向的美国大学历经百年强盛，已经呈现出诸多困境与危机，大学经营产业化、管理公司化、学术资本化等，不但引起美国众多学者的忧虑，而且引起全球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者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未来的学术发展理念必然建立在超越实用科学、规避学术资本化的基础之上！

三、如何发展学术：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展望

高等教育强国之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移植，这对于建设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借鉴德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强国之路，不难看出，两者都是在充分吸收强者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融入本土文化，形成独特学术发展理念，而后迅速崛起的。

为此，我们提出用文化来统摄学术发展的思路。尽管文化的内涵外延多样，但精神文化是其本质内核，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核心应当是从精神层面入手。

中国大学和学术的精神文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国大学作为西学东渐、模式移植的产物，先后从制度、行为和物质等层面，学习了日本、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等多国高等教育的模式。时至今日，应当说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组织架构。但是，独特的大学文化和学术精神还远未形成。中国学术之发展，亟需树立“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亟需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义担当。通过这些精神文化引领和滋养，学术才有可能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规避学术资本主义的侵蚀。

中国大学和学术的精神文化，更需要紧跟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步伐。由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中国大学和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确定的，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不但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更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行动指南。学术只有不忘记人类福祉，国家富强，才能够砥砺前行，永不懈怠；学术只有解放思想，激发活力，才能创新发展，创造转化；学术只有坚持价值信仰，恪守道德规范，才能抵制外界侵蚀，不迷失自我。唯有如此，学术才能够不为物欲横流所淹没，中国高等教育基业才能够由大变强。

培养满足现代工程需要的工程科技人才

雷 庆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第一步是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任务，包括“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相应的具体措施，如“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作为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造福人类社会的工程教育，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必将担负起更加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一、工程活动的本质：综合性和实践性

直立行走和制造、使用工具，是人类诞生的重要标志。制造和使用工具就是工程活动，它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从人类诞生时就已存在。远古时期，人类的工程活动虽然十分简单，但也需要有多方面的经验。比如钻木取火，就要选择合适的木头，掌握用力的技巧。今天，人类的工程活动极其复杂，要运用自然科学原理，要利用各种资源，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要受制于法律和政治制度，要考虑人的体验和文化适应性，更要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说，工程活动就是把多种多样、成千上万的因素综合协调起来，达到造福人类的目的。

另一方面，人类工程活动的结果是创造出人工物，满足人的需求，或是操作人工物为人提供服务。而创造和操作人工物，都不可能纸上谈兵，必须在真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实际动手去做。真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其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开展工程活动必须遵从这些规律。相比之下，教育活动一部分可以通过口头传授来进行，艺术活动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科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思辨能力。

这些活动较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或者影响不那么大。只有工程活动要实打实地生产出产品，实际去运用产品，工程活动与实践密不可分。而且，工程实践必须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进行，特别是涉及安全、效应的指标，来不得半点马虎。

长期以来，工程教育的价值取向像钟摆一样，在以探究自然世界的真理为目的的科学活动和以解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面临的现实问题为目的的工程活动之间来回摆动。工程知识的传授最初完全是在工程实践中进行的。1747年，法国桥梁道路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工程教育的产生，科学基础知识开始成为工程教育的内容，但土木、机械等传统学科仍然强调实践。1930年，康普顿就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他主张加强数学和自然科学教学。从此，美国工程教育越来越重视加强数学和科学基础，对美国保持科学技术领先地位和促进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世界工程教育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逐步失去领先地位。工程教育界开始意识到，工程不仅仅是数学和科学的应用，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数学和科学基础外，工程教育还要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要突出实践。于是，美国工程教育界提出“回归工程”的主张和“大工程观”。

二、工程教育改革的着力点：理念、课程和工程环境

工程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中规模最大的一个门类，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始终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2015年，我国工程教育各种形式的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是1400万人，而全世界工程教育在读人数为3300万至3900万人，我国工程教育规模在世界工程教育总规模中也超过了三分之一。这两个“三分之一”表明，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工程教育大国，工程教育在国内外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工程活动的本质特征和世界工程教育发展的潮流来看，今后我国工程教育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开展更加深入的改革。

一是明确工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人才。基

于工程链的角度，工程活动包括概念构思、方案设计、试验定型、生产制造、市场营销、运行维护、报废回收等许多环节，这一过程还涉及与人、社会和自然界相关的许多因素。在工程活动中，人员各有分工，每个环节对工程科技人才的知识和能力要求不同，这就决定了工程教育具有多样性。但是，对工程科技人才的要求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必须直接参与工程系统的设计、建造或运行。因此，工程教育要帮助学生获得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本领，它涉及价值观、知识、能力等多方面的要素，国内外各种工程教育标准对此虽有不同的概括，但都大同小异。这也是工程教育与其他门类教育的根本区别，应当成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理念。

我国工程教育有着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的传统，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力地支撑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支撑了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重士轻匠”等思想的影响，以及当前大学排名中过于看重学术成果等多方面的原因，工程教育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科学化倾向。如前所述，数学和科学基础是工程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工程科技人才如果仅有扎实的数学和科学基础还不足以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所以，工程教育除了给予学生必要的数学和科学基础、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训练学生在复杂环境下处理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是促进课程的综合化。近年来，我国工程教育课程设置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如压缩自然科学基础和工程专业课程的学时，增加人文、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课程，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但是，大多数课程还是按照学科划分，学生还是分门别类地学习知识，综合运用知识和系统思维的能力亟待提高。因此，促进课程综合化是今后工程教育改革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外具有工科优势的高校推进工程教育课程综合化已有多多年。例如，有的高校把一部分基础课的内容放到专业课中，以增强工程基础知识的

应用背景；还有的高校把不同专业的课程进行各种形式的组合，在原有课程体系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形成一些新专业方向。这些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课程层面上的改革不必对原有课程体系大拆大改，只要对部分内容和组合方式进行调整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且，从局部开始实施改革也比较容易推进。

三是把学生放到真实的工程环境中培养。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都非常重视工程教育的实践环节，但在实践基地建设更多考虑技术的先进性，而对学生是否能够体验真实工程的全过程关注不够。据统计，进入“卓越工程师计划”的高校与 6000 余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培养人才协议，其中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90 学生到这些企业实习，可以接触到最先进的技术，体验现代化大生产，但很难真正参与到工程中，就更不用说完整地参与一项工程。

世界上先进的做法是，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团队，在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独立完成一项工程。例如，美国部分工科高校实施“社区服务学习”计划，香港理工大学师生承担城市建设项目。虽然这些项目中的技术并不复杂，但学生要同利益相关方沟通，要遵循法律法规和工程规范，要适应项目所在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还要与同伴合作共事。这样的真实工程项目包含了许多复杂因素，使学生得到综合培养，尤其是体验到工程的全过程。实际上，工程教育的实践环节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获得全面的工程体验，形成工程意识。要达到这个目的，真实的工程环境必不可少。

展望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工程教育应当而且也能够大有作为。为此，工程教育必须在人才培养的层面上持续开展深入、具体的改革。一方面认真总结和继续保持我国工程教育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借鉴国外工程教育的先进经验，通过两者的结合，形成我国工程教育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

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喻聪舟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探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治理理论,以更好地推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的良性发展,应当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中国国情,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汲取理论资源,审思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

一、新时代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整体的规划: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阶段定位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从适应“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个方面去定位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思考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的根本依据。

我国对教育现代化的追求由来已久,从 1983 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来,实现教育现代化一直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追求。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是审思务必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审思新时代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不能忽视对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历史的历史继承性,而空中楼阁地去建构治理现代化理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后文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

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2020年即将到来对教育现代化的新定位应当是立足《规划纲要》提出的“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之上,对教育现代化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新国情重新思考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既是更好推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是按照十九大精神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教育的要求。

思考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还需要思考面向2035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2030以及与“双一流”建设之间的关系,前者反映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后者体现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首先,联合国在2015年发展峰会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于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这两个重要文件“为实现2030教育目标做出具体规划,勾勒出全球教育的未来蓝图”联合国所发布的这两个文件是教育现代化2030的出发点,“教育现代化2030”“其可近接2020年远衔2050年,而聚焦于教育现代化,正好切合了教育与社会各领域的共同关注点。”顺应国际发展趋势提倡教育现代化2030是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而面向2035的教育现代化则是在《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两阶段的定位,以“融合式”的思维提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既要适应‘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还要兼顾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支撑与引领”。显然教育现代化2030与教育现代化2035都体现了教育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要求,但却有着各自的重要内涵与不同侧重,都对理解教育现代化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在2020行将到来之际,体现教育适当先行的引领,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国情,以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应当被称为面向2035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其次,2015年8月中央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统领,以支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作为指导思想,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是立足我国当代实际的一项国家性的高等教育发展战路。“双一流”是“将世界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以世界一流作为标杆,从而在对比过程中努力将中国的一些大学和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从实质上看“双一流”与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都是以高等教育向“强起来”的转向为目标指向的,具有目标指向上的一致性。但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一方面“双一流”目标的实现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治理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双一流”建设是以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为目标指向的高等教育发展战路,需要不同类型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地进行取舍,而不需要我国全部高校盲目跟风参与;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定位,通过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共同努力实现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愿景,需要通过各种类型高校的共同努力实现的整体性战路,是从全局性层面上对高等教育治理问题的审思。

综上所述,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从我国实际语境出发,立足新时代国情,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兼顾“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双重目标对高等教育治理的思考。

二、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特征

在理解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涵义的基础上,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思考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对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一) 以党的领导为方向保证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不可动摇的根本方向保证。潘懋元先生指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并为一定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服务。”离开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性保障，我国大学的双一流建设会迷失方向，不能与社会发展相合拍，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影响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打造一支能够在政治信仰、政治追求的方向性上给大学发展提供正确保障的坚定领导团队，是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就新时代的时代特点而言，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之一，这一趋势在给教育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复杂的挑战。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大学必需以开放的态度、心态与世界各国大学交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去吸收、借鉴西方的知识，但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中我国大学容易受到各种良莠不齐的观念冲击，只有坚定不移地保证党的领导，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坚定大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以学生的幸福感为中心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的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胡鞍钢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贯彻这一理念，具体落实在高校治理方面体现为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治理现代化。

进一步而言，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键需要落实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上，十九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从“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角度去实现人民的幸福，在落实精准扶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满足社会发展带来的人民群众的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使人民能够更加幸福和谐地栖居。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同样应落实到学生的幸福感上，治理现代化的结果应当有助于满足学生在物

质、精神、知识、政治、生态方面的需要,使学生能够更加快乐地学习、更加幸福地生活。

(三)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法

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吴敬琏先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并认为“面对这些挑战,必须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正面临“增长方式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困境。第一,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教育人数的增长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一直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但随着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开始出现,单纯依靠入学人数增加的“人口红利”与教育规模扩大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收益已经开始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迫切需要转变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第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注重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增长已经开始变化,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理念的提出,我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了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第三,我国正处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尾端,处于前期提出的教育政策的消化期。面临“三期叠加”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应当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大学发展方式,以更好地推动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推动高等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供给侧”是与“需求侧”相对应的,关注供给侧关键改革在转变高校发展方式,从关注高等教育“量”的增加,转变为关注“质”的提升,实现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强调要素质量的提升,还关注通过内部

结构的优化实现变革，因此强调通过理顺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的方式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三、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策略

将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落实需要，立足新时代基本国情，从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出发，思考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展开的具体路径。

（一）营造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时俱进的领导团队

实现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方向保证。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是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全球化进程中处在学术前沿的高校将更加直接地面对世界各国文化、思想的冲击，互联网时代信息数量的巨量化、信息增长的爆炸化、信息呈现的碎片化与信息价值的多元化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知识社会的来临使“教育不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责任了”。更好地应对新的社会趋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给高校的发展“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需要建设学习型党组，通过学习使高校党组织不断实现自身的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地发展自身。学习型党组织是非常重视组织学习，持续开展各种有效的组织学习，并依靠学习提高素质与本领、优化组织结构与行为过程，全面提高组织能力，促进组织高效能创新发展的党组织。具体而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应当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建设：

首先，增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增进党组织成员对理论审思的

深刻性，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情、世情面前不变初心、坚定信仰，才能真正通过学习坚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打造坚定的领导集体。

其次，丰富组织成员的学识水平，以更好地把握、适应时代的需要，引领大学的发展。大学是时代的引领者，大学中的党组织是大学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因此作为大学发展引领者的大学领导团队需要善于把握时代精神。新的历史方位的来临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在以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为主要代表的新兴趋势的基础上，社会不断在生成着新的特点，如“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第二次现代化”等从展现新的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不断更新，再如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的发展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保证高校能够顺应新的时代特点发展，作为高校领导集体的党组织应当以生成性、开放性的态度理解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样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因此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需要提升作为高校领导团体的党组织的知识文化水平，尤其是关于时代发展的知识，以能够更好地把握时代的主题，引领学校发展的方向。

再次，大学诞生之初的中世纪，对学习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波隆那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和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通过教师或学生对大学进行管理，并不存在专门的管理阶层。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治理的问题日益复杂，越来越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专门负责大学的管理事物，因此出现专门人员对大学进行管理具有历史必然性。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对管理大学的专业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需要加强党组织的治理能力、领导能力的建设，增进作为领导者的党组织成员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更好地推进大学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法治化。

（二）唤醒大学的蓬勃活力，增进学生幸福感

新时代大学治理现代化应当通过唤醒大学的蓬勃活力，增进学生的幸福感。大学是融青年才俊与学术大师于一处的平台，是研究高深学问、传播先进思想的场域，是民主精神、思想自由的发源地，更应当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场所，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大学才能更好地增进生活、学习于其中的幸福感。

首先，十九大报告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将生态优美作为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幸福的着力点。因此，唤醒整个学校环境的活力，是增进学生的生态幸福感的重要维度。面向2035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应当重视校园生态环境的建设，美化学校的环境，将校园环境的建设作为整个大学治理的重要部分，并从大学治理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思考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问题。使在校园中工作、学习、生活的个体能受充满生机的校园环境的感染，潜移默化地受到生命力的感染。

其次，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更应当关注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的幸福感。因此以学生幸福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应当唤醒大学的思想生机，增进学生的精神幸福感，应当包容大学中不同的思想、各异的个性，促进学校内部的个体间的思想交流与沟通，怀特海认为“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讨论，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热情之间架起桥梁”。理想的大学应当促进学校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沟通，无论课上还是课下、教室里甚至是草坪上，师生之间可以随时就感兴趣的内容展开热切的讨论，唤起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真真正正地纯粹一把，珍惜难得的时光，为读书而读书、为研究而研究，使生命力尽情展开、想象力尽情飞翔，真正体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趣，使师生之间真正成为“一种共历生命成长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要唤醒大学中的学生的生命活力，将学生培养为“心中有阳光”的积极人。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无论有再为优渥的物质条件，如果总是关注生活中的阴暗面，总是关注他人的缺点，总是“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人是不能体验到幸福的。因此，大学应当关注培养“积极价值观和积极心态为核心，具有知识与智慧、坚韧意志和高效能行动品格的”积极人。大学中的学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应当祛除他们对生活麻木不仁的状态、消极悲观的态度，唤醒学校中的年轻人的朝气、激发他们蓬勃向上的生命状态，呵护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天真，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

（三）尊重大学内在逻辑,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

“供给侧理论认为解决需求端的问题，重点是在供给端打开思路。”“在供给端打开思路”的核心是改善供给端产品的质量，落实到高等教育治理层面关键在于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法，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法。“内涵式发展”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式，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高等教育治理，关键在于尊重大学内在逻辑。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借种树人之口所总结，“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事物生长、发展的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顺应有机体的本性任其自由生长，拔苗助长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机体生命力的丧失。阿什比认为大学是“独立的有机体”使作为有机体的大学的顺利生长也应当“顺大学之性”“顺大学之性”意味着遵循大学的内在逻辑办学。大学办学有其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独特内在逻辑，它是维持大学独立性与特色性的根本所在。坚持大学内在逻辑即坚持按照大学的“本性”治理大学，而一所大学的“本性”只有其自身最为了解，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应当剥夺高校对于自身发展

的话语权，将自身的观点强加给大学。大学在历史演进形成的内在办学逻辑是大学作为有机体的重要基因之一。

大学的办学的内在逻辑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历史性生成的。首先，我国传统教育中的稷下学宫、太学、书院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中不断地凝聚了我国特有的关注个人人生境界、注重个体社会抱负的教育传统，这些传统与我国大学具有文化性的亲和性，是在新时代坚持大学的文化自信的根源，是大学办学必须遵循的内在逻辑。其次，大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凝聚了精神自由、思想民主等价值理想，吸收了纽曼、弗莱克斯纳、克拉克·科尔等教育家的大学理念，借鉴了洪堡、赫钦斯、艾略特、范海斯等著名大学校长的宝贵办学经验，经历了从中世纪大学到英国为代表的教学型大学、德国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或是融入美国实用精神的现代服务型大学的历史变迁凝聚的历史经验，都是大学内在逻辑宝贵资源。尊重大学的内在逻辑意味着尊重大学的历史，尊重大学作为大学的自身规律，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不断丰富、一再变迁，但被称之为大学的机构能够一直存在，就在于无论大学如何演进都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在守望着大学的特有基因。若是轻易地放弃大学的内在逻辑，就会使大学丧失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宝贵遗传基因，失去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特性，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飞速发展，在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尤其应当注意“我国建设一流大学也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避免拔苗助长、痴人说梦”只有踏踏实实地按照大学的内在逻辑办学，才能真正地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推动“双一流”建设。

（四）通过理顺内部权力关系，优化大学治理结构

“以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教育质量提升，关键在于通过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实现高校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个方面在于调整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使高校内部结构更加合理。

结构是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调整高校内部结构首先应当

理清高校治理结构的要素，即高校治理权力的构成。从高校治理的参与上看，党组织、行政人员、学者与学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参与治理的逻辑，在四种治理逻辑的基础上，能够抽象出四种不同的治理权力，即党政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从这个角度看这四种权力构成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

厘清四种权力的边界，使每种权力得到充分的彰显，才能更好地理顺高等教育治理的内部结构。第一，黑格尔研究历史哲学时曾极富启发性的提出政权与行权之间的张力，从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最高层是政权，中层是行政管理机构，基层是世俗社会”网的政治权力结构，其中政权与行政权的区分值得分析高等教育治理问题借鉴，二者之间的区分具体在我国高等教育语境中表现为党的领导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区别，在我国高校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体现了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权权力，结合我国新时代国情并与西方治理做出区别，将这一权力称为党政权力更为贴切。坚持党的领导是面向 2035 的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党政权力在我国高校治理结构中具有核心地位。党政权力通过高校党组织展开，高校党组织自上而下地垂直分布在学校、学院、到学生组织之中，从地位上看党组织在这几类组织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从功能上看党组织主要体现国家意志，为高校提供政治方向上的保障。因此党组织主要在高校的政治导向、发展方向、意识形态等方向上起领导作用。第二，高校的行政权力的治理模式则如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科层制结构，体现的是从学校到学院到班级的垂直治理结构，在理性的基础上的依职务高低决定权力合法性保证。行政组织的管理权主要通过从学校到学院到班级层级性地展开，行政权力的产生是因为学校规模的扩大需要专门人员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使教研人员能够更好地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因此一方面行政权力主要负责管理学校日常的人、才、物，另一方面尽管“不管是学术事务还是非学术事务，只要纳入行政系统的职责范围，就成为行政管理的对象”，但行政权力不应当对学术权力过多干涉，需

牢记行政管理的初衷是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不是相反。因此应当主要通过划定底线指标与物质、荣誉激励等间接方式参与学术、教学事物的管理, 尽量避免以行政强制的方式管理学术事物。第三，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强调以学生幸福感为中心，而学生幸福感的获得离不开学生权力的表达。学生权力主要依托代表学生权力的学生组织展开。从外部结构看，学生组织并不是具体的学生或具体学生的组合，而是在讨论高校治理权力时，代表学生治理权力的抽象性法人组织，作为具体人的学生处于行政权力的科层结构中的最低层级，而反映学生参与治理意愿的学生组织则在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处于同等地位。从内部结构看，学生组织由学生构成，学生之间处于平等关系，因此学生权力内部是人人平等的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因此应当以民主、动态为原则促进学生参与代表学生权力的学生组织。从功能上看，学生权力的产生是为了保证学生幸福感的获得，因此学术权力的对象是与学生幸福感获得相关的学习、生活方方面面的事物。第四，学术权力的产生是由于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为了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必须尊重学术的逻辑，因此学术权力不等同与学术管理，是以学术逻辑为依据而产生的权力，因此尽管行政管理包涵学术管理, 但从抽象的权力视角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反应不同的治理逻辑，因此二者相互独立。学术权力主要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相关组织为依托, 依托不同的学科以横向的方式展开, 不同的学科处于相同的地位。从学术权力产生的逻辑看，学术权力的对象主要是与科研教学相关的事物。按照不同方面的治理逻辑出发，为各类权力划定合理边界, 使不同治理权力之间和谐发展，优化不同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理顺面向 2035 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部治理结构。

如何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目标

熊丙奇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在此基础上，再经过15年努力，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035年主要发展目标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2035年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各项目标，笔者认为，需要特别重视三个现代化，一是教育理念的现代化；二是教育投入保障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教育管理与办学制度的现代化。

一、教育理念的现代化

根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资料，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9万所，比上年增加了5128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比上年增加了535.97万人。全国各级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毛入学率81.7%，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5%，比上年提高0.04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0.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8.1%,比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表明,我国教育已经全面进入普及时代,包括高等教育,在 2019 年,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在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之后,社会更关注的就是教育质量问题,《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聚焦的也是我国教育的质量发展,如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等等。

而要做到在全面普及之上的质量提升,即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需要有现代化的教育理念,用新的理念引领教育发展。以笔者之见,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核心是个性化教育。只有推进个性化教育,才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优质均衡;才能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做到普通高中和中职协调发展;也才能提升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个性化教育是相对于之前所有学校采取相同的办学模式、对学生提出一刀切的要求而言的。由于所有学校采取一个模式培养学生,因而存在千校一面的问题,在这种办学模式之下,学校办学缺乏特色。办学的质量与学校获得的资源密切相关,而当前学校获得的资源的情况是不均匀的。在义务教育阶段,虽然《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设置重点校、重点班,但我国一些地方仍旧有重点校、重点班;在高中阶段,有示范高中、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进入新世纪后,还培育出超级高中;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被分为三六九等,包括“双一流”“985”“211”“一本”“二本”“三本”等等。

这显然会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障碍。目前,在推进义务教育教育均衡时,很多人担心义务教育会由此变得平庸,把优质学校给“消灭”掉。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均衡是指学校获得的办学资源应该一致,在办学资源均衡基础上要实现优质,就必须在每所中小学推进个性化办学,关注培养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时,由于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高和中职学校,中职学校被视为低人一等,不少学生不愿意上中职。近年来,中职招生有逐渐萎缩的趋势,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清理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并让职业院校

办出特色。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可是当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高考升学焦虑,主要原因是高等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大家都想进最好的大学,但最好的大学永远只有 5%~10%,如果再把最好的范围缩小,那就只有 1%。在这种将学校分等级的教育观念影响下,我国高等学校的整体竞争能力将难以得到提高,因此,要消除高等学校的身份差别,给每个学校平等的竞争空间和办学自主权。

概而言之,给每个学生适合的个性化教育,是我国教育进入新的发展历史阶段后,应该在全社会形成的新的教育观。只有形成个性化教育观,才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到的“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另外,形成个性化教育理念,也可厘清当前社会对教育的认识,比如,在我国过去三十年间一直存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一提素质教育,很多人认为就是快乐教育,就不要考试、不要作业,这自然遭到家长的质疑和反对,加之教育评价体系用分数评价学生,因此,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但应试教育却踏踏实实。消除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就需要形成个性化教育理念。个性化教育,是给学生适合的教育,以及适合的教育评价。

二、教育投入保障体系的现代化

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各项战略目标,《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到,要完善教育现代化投入支撑体制。健全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4%。

教育投入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毋庸讳言,我国曾存在比较长时间的教育投入欠债问题,我国在 1993 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到 2000 年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但这一投入目标,直到 2012 年才实现,2012 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首次超过 4%,达 4.28%。由

于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我国教育的普及发展受到很大影响，2010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只有56.6%，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在2012年到2017年6年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以上，这为提高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实现义务教育县域内均衡、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推进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要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各项战略目标，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这是底线要求。如果这一底线要求都达不到，那是很难实现各类教育高质量普及的目标的。事实上，即便达到4%这一比例，这一教育投入水平也不高，从全世界范围看，欠发达国家平均为4.1%，发达国家平均为5.1%，世界平均水平为4.9%。我国要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定的现代化目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应持续提高，达到4.5%或者5%。

与此同时，我国还要改革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目前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我国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部分，现在已经通过省级财政统筹，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但是，占义务教育经费“大头”的教师薪酬待遇，依旧以县级财政为主保障。这种保障机制，直接导致各县的义务教育投入力度不同，教师的工资待遇标准也不同，是拖欠教师工资事件频频发生，以及义务教育存在地区、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要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就必须改革这一经费保障机制，强化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经费的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对不发达地区、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到2018年，我国有乡村教师290多万人，其中中小学近250万人，幼儿园42万多人；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近170万人，占58.3%。可以说，我国各级政府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我国乡村教师存在较为严重的流失

问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乡村教师数为330万。而之所以“留不住”乡村教师,就因乡村教师待遇低,或者各地的教师待遇有较大的差距,于是“人往高处走”。这就要求改革基础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到,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这都需要改革基础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供支撑。之前以县级财政为主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与实现义务教育县域内均衡是匹配的,而要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如实现省域内的均衡,缩小省域范围内各县市基础教育发展的差距,就必须建立新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也是如此,以县级财政为主保障基础教育经费,流入地就面临教育经费支出增多的问题,生均公用经费因省级财政统筹可以随学籍流动,拨付给流入地,但教师待遇这部分,则因为由县级财政保障,很难跨县流动,因此,要给随迁子女同城求学保障,在教育经费方面就需要强化省级财政统筹。

三、教育管理与办学制度的现代化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到的战略目标之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措施,要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质量,必须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办学制度改革。

首先,在教育管理方面,要明确界定政府部门的权责,提高依法治教的能力与水平。我国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相当部分是没有严格依法治教。比如,义务教育阶段不少地方还有重点校、重点班,而《义务教育法》是明确禁止设立重点校、重点班的,这就是没有依法治教;再比如,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现了超级高中,而这些超级高中可以跨地区违规扩大规模招生,其背后是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再比如,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率,我国很多基础教育学校将非中高考试科目的教育边缘化,不重视对学生的德育、体育、劳动教育和艺术教育,这也是教育法律法规不允许的,可没有学校被问责。

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是整体教育的规范有序,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责任,要依法监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依法规范办学。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部门有新的现代化教育政绩观,不能把升学率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政绩。如果地方政府追求升学率,就会在配置教育资源时,将更多教育资源配置给能出升学率的学校,关注少数拔尖学生,由此忽视给每个受教育者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也就会继续把教育、学校继续分不同等级、层次。这会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渐行渐远。

其次,要持续推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从《纲要》颁布到现在的8年间,我国学校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学校制度,但是,距离教育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包括在中小学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增进家校互信;在大学里建立能进行教育与学术管理、决策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真正实现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等等。

教育现代化,最终要落到每所学校办学的现代化,因此,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既是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抓手。这将是我国所有学校在实现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有全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才会形成教育家办学的氛围,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品质,满足每个受教育者接受“好教育”的需要。

意蕴与追求： “四位一体”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

杨灿明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龙头。国家现代化是各方面事业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标，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其中的主要内容，既是支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又是引领国家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引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总体设计和战略部署，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率先实现现代化，进而带动整个教育实现现代化的重大使命和历史重任。

一、《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框架下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意蕴

作为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教育系统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有力助推国家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

1. 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国家对教育现代化总体目标实现的战略设计，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早在 1983 年，邓小平同志在给北京市景山学校的回信中，为学校题词时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后来又经历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等几个阶段，中国教育在政府“自上而下”发展规划的引导和影响下，实现了快速发展、

由大到强。教育现代化目标的确定，依托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呼应全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为新时代开启教育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展示了中国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传播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

2.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地位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动态发展的。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把教育现代化理解为教育变革的过程，即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础上，以先进教育理念为指导，运用先进信息技术进行教育变革，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适应、与国际先进教育形态逐步接轨。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资金，甚至可以引进社会制度，但唯独不能引进的是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只能靠自身的教育来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只有通过教育培养现代化的人，才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先导，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使命。《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重点部署的十大战略任务中，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肩负着不一样的使命，但十大战略任务涉及的教育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改革及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与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息息相关，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这不仅赋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使命、新目标，同时也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3.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新定向，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展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是在制度完善、

多元立体、功能齐全的基础上，构建规模和质量均跃居世界一流的中国高等教育体；二是与时俱进更新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积极对接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三是顺应科技发展和时代潮流，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拓展高等教育发展边界，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四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紧紧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巨大机遇，推动更加开放、更多包容、更深合作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维护全球高等教育的共同利益。

二、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精英化、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潜力巨大的高等教育体，高等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当前，高等教育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但在率先实现现代化进而带动整个教育实现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教育理念和制度、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等方面还存在短板。

1.宏观层面：高等教育现代化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力有待增强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服务现代化的能力还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科技成果转化存在薄弱环节。2016年，国务院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较好的制度环境。但由于我国科技转化精准投入不足、校企合作不够深入、成果转化机制阻碍等因素，导致我国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二是社会服务职能发挥不充分。高校的五大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交流，其实质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五大职能相互依托、互为促进，但部分高校存在重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而轻社会服务的现象，社会

服务主动性不够，动力和能力都需进一步提升。三是应对变革和挑战的能力有待增强。尤其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环境下，高等教育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的服务能力和创新动力还比较缺乏，人才的智力支持作用发挥得不显著。

2.中观层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和高等教育制度有待完善

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必须坚持教育理念和制度紧密联系基本国情，深植于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十分重视学习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借鉴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方式、方法以及理念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素质教育”“分类管理”等较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但在许多领域照搬、硬套欧美发达国家教育模式的现象仍比较普遍，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和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

3.微观层面：人才培养质量和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超过 50%，从规模上来讲，我国已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从教育质量上来讲，我们的高等教育已从“跟跑”转向部分领域“并跑”“领跑”，但离教育强国还有一定距离，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在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内地 6 所高校入围全球百强，40 所入围全球前 1000 名；2019 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 72 所高校挤进榜单，有 64 所大学排在前 1000 名之内；而根据 2019 年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TOP200 里的就有 70 所美国大学。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2017 年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我国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学科专业设置等方面相较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还有差距。此外，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政府教育治理职能与高校办学自主权之间权力定位和权力边界需进一步理顺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还不充分，开放多元的共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这些都制约着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三、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追求

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开启了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更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动员令和进军令。《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将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使命引领方向，目标凝聚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新形势新使命，高等学校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持续推动内涵建设、特色发展，服从服务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力争教育强国战略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先行。为此，高等学校必须认识到位、师资归位、改革就位、视野升位，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和水平。

1.认识到位，牢固树立高等教育发展新理念

坚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遵循。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随着全球化 4.0 的不断深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重大科技创新持续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断重塑高等教育形态。高等教育现代化就是在传统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动力机制、制度安排进行的全面转变和革新，是高等教育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应然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高等学校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牢固树立高等教育发展新理念，实现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应对新时代新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高校要坚决贯彻落实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使高校党建龙头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高校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带领广大师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践行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导高等教育事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依托高水平技术创新，充分利用翻转课堂、MOOC 和云端学校等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构建新时代教与学的关系。7 通过打造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完善高等教学体系，建立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

2.改革就位，推动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源动力。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时间节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精确谋划。高等学校必须坚持以改革谋发展、以改革促发展，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实现改革再出发，让改革成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引擎。一方面，要把稳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快马加鞭，乘势而上，攻坚克难。高等学校要敢于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对于阻碍高等教育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努力压茬推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促使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实现有效供给和充分供给。另一方面，要强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整体推进、重点发展，确保改革进度稳妥有序，蹄急而步稳。以“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以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等战略行动为契机，不断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打好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积极融入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革命”，推动“双_流”加快建设、特色建设、高质量建设，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力气狠抓落实，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任务从倡导性的“推动”提升为刚性的“实现”。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支撑着高等教育现代化。孙春兰副总理提出，要“在加强科学管理上下功夫，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高等学校要坚持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按照国家和国家和社会协同治理的理念处理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加强高校内部治理制

度现代化建设、注重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同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高等学校要着力完善中国特色鲜明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角色力量，实现高等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辩证统一，构建学术自由、管理有序的学术利益共同体。进一步落实中央“放管服”政策，努力提高高校自主管理权，同时推动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升整体办学治校水平。

3. 师资归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要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工作母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保障教育质量的高水平高水准，必须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能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养更多人才、积累更多人力资本、提供更强人力支撑。

现代化的高等教育，要求师资队伍年龄结构更加优化、学缘结构更加科学、职称结构更加合理，形成德才兼备、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高水平教师梯队。同时，高等院校要积极为教师发展创造空间，搭建多样化的发展平台，提供更加多元的发展机会，切实给予关怀和帮助以解决教师工作中的难题。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特别是要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引导高校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做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以良好的教风带动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人才来担当。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评价教师业绩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校必须以此为目标，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用人才，旗帜鲜明地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落实到位。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用“四个自信”明心立志，通过多种途径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

动 100 周年大会上寄语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六要”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持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

4.视野升位，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要把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突破口。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第 44 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 1 月 24 日定为国际教育日。这充分说明，教育对全球化的发展极其关键，教育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的国际化。面对国际教育改革的新潮流，高等学校应高瞻远瞩，紧紧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新机遇，通过学习借鉴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高等院校要具有国际视野，以开放促发展，善于学习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把世界一流作为行动标杆，通过互学互鉴、交流融合，有针对性地汲取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努力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教育产业链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突出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方案，积极“走出去”传递中国声音。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发展史，决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必须始终紧密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特别是要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社会主义为取向，主动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让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力和影响力适配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同时，通过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吸引更高质量的留学生来华求学。

主 编	聂天保		
副主编	吴德明		
编 辑	官 璐	地 址	武汉轻工大学常青校区行政楼 620
	李笃珊	电子文档	http://fgc.whpu.edu.cn/
	张凌云	电 话	83927097